

考古呈现浙江深厚历史文化

方向明

核心阅读

以“10000年上山”“5000年良渚”“1000年南宋”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正清晰呈现其深厚内涵和独特价值

1938年，施昕更出版《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这不仅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真正拉开了浙江考古的帷幕。

通过考古人的努力，浙江百万年旧石器时代的空白被填补，自万年上山文化至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被建立。以浙江地点命名的上山、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良渚、好川、钱山漾、肩头弄等考古学文化，几乎涵盖了长江下游史前至青铜时代的全貌。

上溯万年文化之源

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基础。距今万年的上山文化，出土了栽培稻遗存。目前浙江境内已发现上山文化遗址逾20处，上山文化环境聚落已经有了农耕村落的雏形。八卦式的上山文化彩陶，年代远早于渭河流域的老官台，内容和风格也迥然不同。2006年上山文化命名。2021年7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出，要“推进上山文化申遗”。

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出土了世界最早的独木舟。舟体含有相当大的盐分，有边驾艇和帆存在的可能，完全适应浅海区域的活动。余姚井头山遗址，深埋在现地表下5—10米，上面覆盖厚达五六米的海相沉积淤泥。遗址有稻作生业经济特征，但又以海产捕捞为主，全面展示了我国先民对于海洋的认识与对海洋资源的利用。井头山和跨湖桥还发现了漆器，井头山两件木器上的黑色涂层确定为天然大漆，跨湖桥独木舟孔洞填补的胶黏剂也含有生漆。

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以浙东姚江河谷为主要分布区，精耕稻作经济发达，出现了如田螺山遗址复杂干栏式的高级大房子，说明聚落群已开始分化。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河姆渡文化的确立，证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丰富世界早期文明

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基本谱系是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的良渚文化，中心在杭州良渚古城。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的核心区、水利系统和外围郊区总面积达100平方公里，以莫角山宫殿区为核心的内外郭面积约8平方公里，整个古城及外



围水利系统土石方总量达1008万立方米，充分展现了社会组织结构复杂化和公共权力的存在。外围水利系统是世界早期水利设施的卓越典范。古城内部布局和功能结构基本明确，城内钟家港河道两侧有琢玉、石器后期制作、骨角牙器制作、漆木作、大木作等“百工熙哉”的遗存，充分展现了当年的繁荣图景。

玉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标识。良渚人创造了以复杂玉饰和琮、钺为代表的成组玉礼器系统。琮是玉礼器中的重器，是一个由平面和立面组合而成的复杂几何体，堪称多层次宇宙观的浓缩模型。“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礼”和“礼制”，“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器”，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器以藏礼”的观念。良渚成组玉礼器作为拥有者身份地位的标识，作为聚落等级和规模、中心和周边的反映，是前青铜时代中华大地上“器以藏礼”突出的代表。玉器上常见的太阳神像在良渚文化分布区有着广泛认同。

包含复杂工程技术和高效组织能力的都城和水利建设，带着奢侈色彩的玉器工艺，自然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杭州临平茅山发现5.5公顷古稻田。余姚施岙周边发现90公顷古水田，有灌溉渠、灌溉口、田埂。植物考古学家郑云飞根据土壤中遗存的水稻硅酸体与稻谷重量的关系，推算出茅山古稻田单位面积产量约为141千克/亩。莫角山宫殿区东部被烧毁稻谷约2.4万斤，池中寺粮仓炭化稻谷埋藏量达40万斤，足以证明良渚社会经济基础的坚实。良渚文明为世界早期文明、早期国家和早期复杂化社会研究提供了新内容。

勾勒越文化历史脉络

浙江是越国故地，探寻丰富越国历史是浙江夏商周考古的主要任务，通过中心遗址、土墩墓、越国王陵和贵族墓葬的发掘，基本构建了越文化起源、发展、壮大的历史脉络。

浙北地区的湖州昆山、下菰城、余杭小古城等，是商周时期的中心聚落遗址。昆山是浙江境内唯一出土琮、璧玉器和卜骨、青铜器的商代晚期周代初期大遗址，新近还发现了铺设地袱再立柱的大型建筑基址。衢州衢江区已发现多座西周时期高等级土墩墓群，还出土了青铜车马器，这一地区地望与《国语》等记载的“姑蔑”相吻合，这一发现或将揭开一段先越国尘封的历史。

安吉古城始筑于战国，延续至汉六朝，古城东南龙山墓群的八亩墩、九亩墩两座春秋晚期超大型墓葬，共用障壕，并各有两圈陪葬墓。八亩墩15米高的主墓土墩有石护坡和挡坎，主墓

外侧有密集摆放陶器器的超长器物坑，墓主佩戴复杂冠饰。

绍兴兰亭印山越王陵，是迄今第一座明确的越国王陵。三面髹漆的巨大枋木构成长达34.8米的人字形木椁，椁中室置放大型独木棺，椁外侧包140层树皮，再填筑大量木炭和青膏泥。绍兴东湖香山一号大墓，规模堪比木客大冢，虽遭严重破坏，但根据遗物和相关测年，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早，意义重大。目前绍兴平水盆地越国王陵区的布局已基本弄清，周边古水系分布状况也基本明确，越国考古前景可期。

东南形胜，人文荟萃之地

五代钱氏吴越建国之后，杭州成为“东南形胜第一州”。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吴越国纳土归宋。宋室南渡定都临安，浙江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文荟萃。

墓葬、城市和手工业遗存是浙江宋元考古的主要内容。临江城和绍兴南宋皇陵在中国都城和陵寝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学术价值。南宋墓葬考古揭示的丧葬制度、思想观念、随葬器物的变迁，是讨论社会礼俗“宋元明转型”具体直观的材料。全面复原南宋临安城、嘉兴子城的平面格局，揭示复杂的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是历史和考古学的重要目标。

浙江是原始瓷和成熟瓷器的主要起源地。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原始瓷窑址群，从夏商之际开始出现，历经东西两周，连绵不绝。尤其是战国时期大量烧造的仿青铜礼器和乐器，质量已接近成熟瓷器。越窑“秘色瓷”自晚唐开始声名鹊起，上林湖窑场即为秘色瓷产地，以瓷质匣钵烧制的秘色越器为越窑的巅峰之作。青瓷从汉六朝早期开始发展，宋元时达到鼎盛。浙江有越窑和龙泉窑这样的青瓷窑系，青瓷产品最迟从唐代开始输出海外，制作技艺广泛传播，影响了境内外的瓷器生产和审美取向，更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贡献。

浙江全省现有世界文化遗产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1处。上山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越文化、南宋文化、青瓷文化等已成为具有较高知名度、鲜明辨识度的浙江文化标识。以“10000年上山”“5000年良渚”“1000年南宋”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正清晰呈现其深厚内涵和独特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①：绍兴南宋皇陵二号陵园一号享殿和庭院遗迹。李晖达供图

图②：良渚古城遗址反山、瑶山出土琮、璧、钺。方向明供图

图③：上山文化义乌桥头遗址陶壶。蒋乐平供图

图④：浙江慈溪上林湖秘色瓷窑址出土的瓷盏与盏托。方向明供图

版式设计：赵德汝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铜牌。先怡衡供图

绿松石，又叫松石，通常呈蓝、绿色，常见块状、结核状，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玉种。

考古学家们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绿松石文物，距今9000—86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此后，绿松石逐渐被中原其他地区的居民接纳；河南裴李岗遗址、沙窝李遗址以及郟县水泉等遗址，先后发现一批绿松石制品，仰韶文化的先民甚至发明了粘结晶镶嵌工艺，用粘剂把琢磨成形的绿松石片镶嵌到其他物品上。

伴随着黄河流域古代文明的不断发展，绿松石以中原地区为“放射”原点，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异彩。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以及后来的陶寺文化、石峁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绿松石制品。黄河下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也将绿松石作为珍贵的装饰材料。从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到南方地区的屈家岭、大溪、石家河、石峡文化等地，绿松石如漫天星斗般闪耀在东方。

夏商周时期，绿松石成为夏文化的象征之一，制作工艺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铜牌饰，嵌入的绿松石厚度仅0.1厘米，采用满镶工艺，密不透风且色泽统一，使用的粘剂近4000年依旧保持粘合力，令人惊叹。同样是在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由2000余片绿松石组合而成的“龙”。石龙形体宏大，巨头虺尾，身体起伏有致，用绿松石片拼出菱形鳞片，制作之精巧、所用绿松石之多，世所独有。

如此大规模地使用绿松石，必然需要大量矿料。这些珍贵的绿松石矿从何而来呢？

现代地矿调查资料显示，我国绿松石矿主要分布在东秦岭山区和祁连山周边地区，资源较为集中，与绿松石“漫天星斗”式的分布是矛盾的。但这恰好反映出，早在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我国就存在大范围、远距离的“绿松石之路”，为我国早期人群交流和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实证。西北大学考古队在东秦岭山区的陕西洛南县河口、河南卢氏县竹园沟、湖北十堰市等地发现多处绿松石采矿遗址。其中洛南县河口遗址年代在距今3900—2500年左右，跨越夏商周三代，由大大小小10个矿洞组成，最大矿洞深约40米，最高处13米。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考古类型学分析指向二里头文化。用科技考古手段分析绿松石的微量元素、同位素特征，也证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部分绿松石废料确实来自河口。

商周之际，中原的绿松石文化和采矿技术传播到新疆东部地区。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绿松石文物出土于天山北路遗址，距今3500年左右。考古学家们在祁连山周边的甘肃敦煌、新疆哈密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批古代绿松石采矿遗址。巴音郭楞州的黑山岭采矿遗址东西总长约10公里，南北宽约2.5公里，年代从商延续到春秋战国，已发现古矿点110余处，是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采矿遗址。大量房屋、灰堆、陶器、木器和采矿石器、矿料、选矿点等生产生活遗迹，向我们展示了古代采矿工业的发展状况和矿工生活的点点滴滴。

直到今天，绿松石仍然是中华大地上最受人们喜爱的宝玉石之一。它们被制作成项链、手镯、耳环等饰品佩戴在身上，被制作成工艺品摆件陈列在家庭和展览馆里，见证祖国的平安与富饶。美丽的绿松石，一直在讲述多彩的中华文明故事。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绿松石讲述美丽故事

先怡衡于春



匠心独运

故宫中极具特色的建筑之一，即为角楼。角楼共有4座，分别位于故宫城墙的4个转角位置，其初始功能主要用于军事瞭望及防御。史料及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多个朝代的宫城城墙上均建有角楼。如先秦古籍《考工记》的“匠人营国”部分就规定，宫墙角楼为“七雉”。《墨子》中的《备城门》《备蛾傅》等部分记载，在城墙拐角处修建防护建筑，其样式必定是重檐形式。故宫建立在元代皇宫的基础上，元皇宫被拆除之前，其城墙四角均有三层屋檐、琉璃屋顶的角楼，这在元代文学家陶宗仪所著《辍耕录》中有专门记载。故宫角楼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建成，至今仍保存完好。

故宫角楼有着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从构造角度来看，它是多种类型建筑或建筑构件的“组合”：1个三重檐的四角攒尖亭、4个重檐歇山顶类建筑、2个单檐歇山顶类建筑，形成了独特巧妙的结构方式。其中，三重檐、重檐、单檐分别指屋顶含有三层、两层、一层屋檐；攒尖、歇山均属于我国古建筑样式，前者是指所有屋脊汇于一点的屋顶造型，后者是指在一个四面坡屋顶上叠加一个两面坡屋顶后的屋顶造型。这样的构造方式，充分实现了建筑功能与造型的统一。功能方面，亭在我国古代建筑中，可以作为城市的标志物，如街亭、市亭、都亭等，还能作为观察敌情用的岗亭，如《墨子》《备城门》篇就有每百步设4米高岗亭的记载。角楼

故宫角楼的建筑智慧

周乾



图为故宫角楼。

周乾供图

上述功能兼备。我国古代建筑一般比较低矮，角楼建造于10米高的城墙之上，观者视野开阔，因而角楼内部无需设置楼梯。造型方面，歇山顶类古建筑包含的翼角数量众多，而古代工匠为突出这一效果，不仅在建筑四面使用重檐歇山顶，还保留了三重檐攒尖亭的翼角。多达28个翼角均匀分布在4个方向，产生了极致的张力。

民间传言，故宫角楼的构件数量为“9梁18柱72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民间用数字

“9”的倍数来形容角楼的构件，或许是因为9为最大的阳数（单数），寓意数量最多。角楼的梁、柱、脊确实种类繁多。梁包括角梁、井口梁、顺梁、抹角梁、太平梁等，仅翼角用梁就有56根。角楼一层立柱就有20根，二、三层还有不落地的童柱、瓜柱、雷公柱等。角楼的屋脊包括斜脊、正脊、垂脊、围脊、博脊等，累计为76条。

角多、檐多、脊多，屋顶曲线优美，起翘的屋檐参差不齐、高低错落、均匀雅致，再饰以屋顶正中的鎏金宝顶，增加了角楼沉稳的气质。角

楼每层屋檐下的斗拱整齐有序，弧度优美，极具艺术感。斗拱下的三交六椀菱花纹饰门窗，各直椀与斜椀相交后组成无数等边三角形，每组三角形内有六瓣菱花，这些菱花相交后又围成一个圆形，形成虚实相映、繁花似锦般的几何造型。立柱巧妙布置于建筑的各个转角，与梁枋均为卯榫连接，形成东方古建筑特有的刚柔相济之美。支撑立柱的台基稳固有力，完成城墙与角楼的衔接过渡。

建筑色彩是造型的点缀。蓝天白云下，角楼金黄色的瓦顶流光溢彩，屋檐下青绿色的斗拱阳光不易照射，表现出一种阴柔之美，朱红的立柱与门窗尽显阳刚之气，洁白的台基给人高雅之感，而灰色的城墙呈冷峻威严之势，暗示强大的防御功能。角楼建筑整体与护城河中的倒影，共同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人造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完美融合。

故宫角楼还有着深邃的文化内涵。角楼曾经用于军事防御，因而也是我国古代军事文化的重要内容。角楼采用四面四角布局的方式，与我国道家文化中“四正四隅”“藏风聚气”理念相符。角楼屋顶大量采用的仙人走兽造型，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反映。故宫角楼汇集了我中国传统建筑精湛的技艺和优秀的文化，是古代建筑科学和美学的融合，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

